

# 黄庭坚熙丰诗歌的知识性写作

陆嘉琳

**内容提要** 黄庭坚熙宁、元丰年间频繁化用扬雄故实，形成熙丰诗中独特的“扬子”现象。山谷诗中的“扬子”在历史人物、自我想象与他者形塑之间构成多重镜像，这与其大名府时期的学官身份与学术立场密切相关，以此寄寓寂寞草玄的学人心迹。同时，山谷对于“扬子”的学人认同也体现在引书助文的辞章倾向，推动熙丰诗艺的知识化转向，成为形塑山谷诗学形态的重要助力。“扬子”想象背后学术与文术线索的交织揭示出山谷诗学的构建场域。这种知识本位的创作倾向是新学笼罩之下学术语境与诗学诉求合力的结果，不仅开拓出具有“山谷本色”的知识性写作，也作为宋调演进的学理所在，引领着北宋后期诗坛的整体走向。

**关键词** 黄庭坚；熙丰；扬雄；知识性写作

在扬雄的接受史中，黄庭坚对于扬雄的接受尤其值得关注。山谷诗中涉及扬雄的表达共有40余处，不仅在数量上无出其右，呈现方式也自出机杼。通常而言，后人对扬雄的接受包含儒生与辞人两面，“两汉之世，专以大儒归扬雄。魏晋以来，始以辞人视雄。至于盛唐，遂以扬、马并称。独韩退之以荀、扬大醇，追配孟子，为起衰之特笔”<sup>[1]</sup>。唐前好以“辞人视雄”，韩愈的道统叙述抬升了扬雄的儒学史位置，北宋“尊扬”一脉相承，其诗中形象也向着儒生的一面倾斜<sup>[2]</sup>。至山谷诗好用“草玄”“问字”诸典，在形象塑造中寄托学人心迹，则使扬雄形象愈趋书斋化，构成接受与书写史中的一个拐点。

“扬子”现象聚焦于熙宁、元丰时期，与其时山谷身任大名府国子监学官的任职经历有关，实为学人身份的一种写照。扬雄疏离于当世学风的“草玄”之姿，同山谷身处新学语境中的学术诉求构成了一种异代共鸣。与此同时，山谷对于“扬子”的学人认同也包含着对其依傍才学、“引书以助文”的辞章倾向的肯认。这一文术脉络的承继，打开了“扬子”传统通向诗学的转化路径。刘克庄所谓山谷诗“搜猎奇书，穿穴异闻”“虽只字半句不轻出”<sup>[3]</sup>的特点，便是在熙丰时期逐步成熟<sup>[4]</sup>。从这一点来说，“扬子”想象也为山谷熙丰诗歌的知

识化转向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其形象背后学术与文术两重意蕴的交织，尤能彰显出表层诗艺流变之下时政语境、思想学术与诗学之间的复杂生态。

本文试以“知识性写作”把握山谷熙丰时期的诗学实践，通过勾勒“扬子”想象在山谷诗学中的转化路径，抉发知识性的创作姿态同学术背景之间的深层联系，从而对山谷知识本位的诗学建构略作学理阐释。与此同时，扬雄的影响不仅是山谷熙丰创作转型的重要助力，也奠定了宋调中自成一体的“山谷本色”。故对于理解山谷同王安石、苏轼等人在才学为诗方面的同中之异，“扬子”想象也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 一 历史镜像：山谷熙丰诗中的“扬子”现象

山谷化用扬雄相关的典实入诗，集中见于熙宁、元丰时期。这一用典的聚焦构成熙丰诗中标志性的“扬子”现象。如“避地梁鸿真好学，著书扬子未全贫”<sup>[5]</sup>“子云窗下草玄经，寒雀争喧户昼扃。好事应无携酒榼，相过聊欲煮茶瓶”<sup>[6]</sup>，屡屡化用扬雄家贫嗜酒、“好事者载酒看从游学”的故实；“沙鼎探汤供卯饮，不忧问字绝无人”“把诗问字为汝说”<sup>[7]</sup>，用“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一事

等等。山谷也常于酬唱中自称为“草玄客”，“惟君尚寂寞，来观草玄笔”<sup>[8]</sup>“频来草玄宅，共语清入寥”<sup>[9]</sup>。这类用典大多指向书斋生活的自况，在扬雄故实同日常生活的叠加中构成了一种寂寞草玄的自我想象。更具代表性的是山谷元丰六年（1083年）所作《读方言》。这首读书诗别具一格地描绘出诗人阅读《方言》时“涩读劳辅腭”“九土可领略”的真切感受，并戏言“颇似扬子云”、家贫无酒而“愿多载酒人，喜我识字博”<sup>[10]</sup>，以博学自得，改变了诗中“扬子”的一贯形象。

诗歌史中扬雄形象的流变每与思想史的线索交织，其呈现角度的差异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思想资源。从扬雄的接受史来说，宋人“尊扬”，源出韩愈。韩愈将扬雄列入儒家道统，接续孔、孟。但西汉儒学原本亲近荀子更甚于孟子，扬雄便夏子思荀子一派影响而有“尚智”之说，“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sup>[11]</sup>。这种对于智识的注重并不纯然以伦理为归宿，更近乎一种相对纯粹的知识主义<sup>[12]</sup>。山谷笔下“扬子”的书斋化走向，彰显的正是扬雄尚智的一面。这在重塑“扬子”面目的同时，也折射出山谷自身的学人性情。

山谷自熙宁五年（1072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任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扬子”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学官生涯催生的产物。地方学官一职虽是清贫，却于读书治学有益。其时山谷笔下多有关于“学省非簿领，卧病常闭关”而读书乐道、尚友古人的自白，“赏逐四时改，心安一味闲。古人虽已往，不废仰高山”<sup>[13]</sup>。而如“小霁卧观书，凉轩夏簟舒”<sup>[14]</sup>“隐几惟观化，开书屡绝编”<sup>[15]</sup>一类对于独坐观书的刻画，也是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常见事象。山谷对“扬子”学人形象的偏爱，首先便源自这一书斋经验的沉淀。

但就表现手法而言，山谷以“扬子”自况并不停留于日常图景的再现，而是往往被置于一种二分式的诗歌布局之中。如《次韵感春五首》其五，“茶如鹰爪拳，汤作蟹眼煎。时邀草玄客，晴明坐南轩。笑谈非世故，独立万物先。春风引车马，隐隐何阗阗。高盖相摩戛，骑奴争道喧”。诗歌由煎茶写起，前后构成两幅画面的并置。轩窗之内的草玄

客烹茶品茗，轩窗之外则是红尘扰攘、车马喧阗。“春风”以下数句书写声音，更在静与喧的对照中塑造里外空间的隔阂感。又如《次韵答常甫世弼二君不利秋官郁郁初不平故予诗多及君子处得失事》诗中“频来草玄宅，共语清入寥。处己愿如舜，致君敢不尧。回观势利场，内热作惊潮”数句，“草玄宅”同“势利场”的对立更为醒豁，后者符号性的存在尤其衬出“草玄宅”这一指代中的理想建构意味。这种对比手法可追溯至左思《咏史》：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竞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sup>[16]</sup>

诗歌前后八句以扬子同权贵对比，这种章法承自阮籍的五言诗<sup>[17]</sup>。左思在其中注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以一种极具情感力度的对立结构吟咏扬雄寒士不遇的命运，由此奠定“扬子”形象谱系的基调。相较而言，宋人对扬雄的书写往往经过了一层陶潜“五柳先生”的过滤，唯有山谷诗仿效《咏史》而每有拟古之意。<sup>[18]</sup>只是不同于左诗中孤愤郁怀寄托于身后名的寒士，山谷诗笔下的“草玄客”多淡化了士不遇的焦虑，以冷官闲曹的生活演绎“富贵功名茧一盆，操车头绪正纷纷。肯寻冷淡做生活，定是著书扬子云”<sup>[19]</sup>的自处之道。

对山谷而言，“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经”<sup>[20]</sup>，杜门读书是一种出处姿态的表征。山谷《与太虚》一文有言，“古之人不得躬行于高明之势，则心亨于寂寞之宅”<sup>[21]</sup>。“寂寞之宅”语出扬雄《解嘲》“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哀帝之世权贵颠仆，“攫拏者亡，默默者存”，扬雄“默然独守吾《太玄》”的学者坚守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时未可而潜”而“隐于《玄》”的背世姿态。<sup>[22]</sup>这一语境中的读书治学主动疏离利禄之途，将知识的追求提纯，从而树立了一种专注于知识的人生形态<sup>[23]</sup>。山谷以扬雄自拟也蕴含着这样一层“与世自少味，闭关非有心”的用意。除去自喻，山谷以“扬子”描绘他者也多指向疏世退隐的出处之态。如《次韵师厚病间十首》其五谓外舅谢师厚“经玄事寂寞，发白官闲冷”，诗意落脚于

“东里与无趾，渠有幸不幸”，以言全身远害<sup>[24]</sup>；《次韵奉送公定》“已为冥冥鸿，矰缴尚安施”化用《法言》“治则见，乱则隐。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sup>[25]</sup>，亦言退处避祸。据范纯仁《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谢师厚熙宁间因不赞同遣使专管地方苗役之法而遭诬，“耻于对吏，乃自引咎”，尔后便“废居于邓”“逍遥里中，杜门读书”，同扬雄的冥鸿之志颇为契合<sup>[26]</sup>。至如《戏赠彦深》“虽无厚禄故人书，门外犹多长者车。我读扬雄逐贫赋，斯人用意未全疏”<sup>[27]</sup>，借由扬子“逐贫”戏笔勾勒李彦深的寒士形象，其远离宦途而免去祸福风波的生平，也从另一侧面呼应着扬雄的全身远害、明哲自保。

据山谷元丰末《放言》诗，“回首古衣冠，荆樊老丘墟。欲付此中意，归翻虫蠹书。短生忧不足，此道乐有馀”，史注谓“回首古衣冠”句中“古衣冠”谓背时也，不随时俯仰，在熙宁间皆斥逐也<sup>[28]</sup>。“扬子”想象在历史人物、自我呈现乃至他者形塑之间构成的多重镜像，颇有勾勒为熙丰新政边缘化的士人群像的意味。这与熙丰诗中的“少年”适成对照。如山谷《次韵奉送公定》诗言“燕赵游侠子，长安轻薄儿。狂掉三寸舌，躡登九级墀”。史注“谓熙宁用人非贤而谓之贤，贤则指为不肖也”。诗中凭藉口舌躡等进身“少年”，正谓其时“改制立法，自眩文词，附已者超迁之”而拔擢的新进<sup>[29]</sup>。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镂板颁行，下发各地官学。与此同时撤换国子监直讲，并首先向北方五路派出学官，其中包括大名府所在的河北路，一律授以新学经义<sup>[30]</sup>，以至于“当时历金门，上玉堂，纡金拖紫，朱丹其毂者，一出王氏之学而已”<sup>[31]</sup>。这在为少年子提供进身捷径的同时，也形塑着学风与士风。山谷《送吴彦归番阳》诗中“诸生厌晚成，躡学要侏狙。摹书说偏旁，破义析名象”<sup>[32]</sup>数语便“讥王氏字解”<sup>[33]</sup>，形容诸生为学急于求成。相比研阅六经，围绕《字说》建构的解经体系显然更易速成，致使学风趋于功利。山谷其时身任学官，每感于旧学寂寞，如元丰初年（1078年）《再和答为之》诗末二句“尚恐素餐钱，诸生在城阙”，“城阙”语出《诗经·子衿》，“刺学校废也”，隐然与前半篇中“北

门一都会，尘埃人卒卒。高盖如秋荷，势利相奔谒”构成一种呼应<sup>[34]</sup>。而诗中对比利禄争逐与学人寂寞的拟古意味也在这一语境中得以深化。篇末“诸生”同“惟君尚寂寞，来观草玄笔”的对立，实际上体现出好尚“新闻”与专意“学古”两种为学立场，而后者之“草玄”正提供了一种坚守古学的学人典范。

故山谷熙丰诗中还有一类作品专以扬子劝学。如规诫其弟仲熊，“后生晚出不勉学，从汉至今无扬雄”<sup>[35]</sup>；勉励学生杨瓘当进学不倦，“草玄事业窥周易，作赋声名动汉朝”“吾子已强学，草玄宜不忘”<sup>[36]</sup>；宽慰科场失利的崔常甫、王世弼勿以名利挂怀，在自比“草玄”的同时与二生“相期淡薄”等等。其时讲学所作《孟子断篇》也将“扬子”视为“力学”的典范，“扬子云曰：孟子勇于义，而果于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虽不多，以子云之言行反复考之，足以发子云之知言。……由孔子以来，力学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来，力学者多矣，而才有扬雄”<sup>[37]</sup>。这一方面源于扬雄素来强调“学”的重要性。他继承孟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的观点，主张“君子强学而力行”，由学而成圣，而这也正是山谷学古论的核心<sup>[38]</sup>。与此同时，扬雄疏于当世的学术反思，也往往与山谷达成一种共鸣。

在汉代经学取士的制度之下，五经博士系统垄断学术话语，产生种种弊端。扬雄是当世学风中的一股逆流。如其对于“为道之学”与“为利之学”的分辨，便针对“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生庸俗化的现象而言<sup>[39]</sup>。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义利之辨是山谷推举“扬子”的首要因素。山谷元丰初年所作《论语断篇》有言，“夫趋名者于朝，趋利者于市，观义理者于其会”<sup>[40]</sup>。其时学子徒以经术为“卜利禄之具”<sup>[41]</sup>，欲凭“穷年抱新书”而“屈指推日星，许身上云霞”<sup>[42]</sup>，自与“为道之学”相悖。其次，扬雄所主张的为学门径亦为山谷所取。山谷曾以“扬雄之学”作为“精求经术，又能博极群书”的典型<sup>[43]</sup>。扬雄主张“尽其心于圣人之道”<sup>[44]</sup>，自与恪守章句的汉儒家法不同。而山谷针对其时新学末流“分章析字，旁引

曲取”“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sup>[45]</sup>，亦强调“尽心”而“自得”。同时，正如清人胡煦所言，“汉之博学以雄为最”<sup>[46]</sup>，扬雄能够兼顾精、博，这也与其对于经术取士的反思有关。《法言·学行》有言，“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豢已”<sup>[47]</sup>，《论语》《孝经》等“同经之书”虽不立学官，但与五经统归于圣人之道，不当有所偏废。山谷针对学子“穷年抱新书”所致“百家之言，陈弊腐烂”<sup>[48]</sup>的知识偏狭，而强调“古人以圣学，未肯废百家”的为学之道，也可谓与“扬雄之学”遥相呼应。

可以说，山谷熙丰诗中的“扬子”想象不仅为学人身份的投射、出处理想的观照，更作为一种源于学立场的表征，以学古乐道的理想同主流知识世界形成抗衡。而以“扬子”自喻或他喻所形成的修辞现象，也就象征着勾连山谷与同道之士的精神纽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体现在同友朋“相期淡薄处”的价值共鸣，也形塑着山谷同周遭士人的文本沟通方式。熙宁八年山谷和答王世弼诗言“猎山穷鹑鴛，罩海极虾蚬”，称道王诗学养富赡。史容注指出，“集中《代书》云‘文章六经来，汗漫十牛车。譬如观沧海，细大极龙虾’，即此诗之意也”<sup>[49]</sup>。《代书》诗作于元丰年间，以“文章六经来，汗漫十牛车”劝诫仲熊勤勉力学而论及学问、文章的关系，本于对熙丰时期“士以谈经相高”而“文章之气日衰”的反思。而在前后两首诗的互文中，诗学也随之被纳入“文章六经来”的为文之道中。映证这一点的最佳例证便是山谷这首奉和之作。《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一诗长达七十六韵，押上声韵，韵字生僻，多熔铸典籍中的散语为“诗家语”，征引极博。尔后元丰、元祐时期倚傍书卷、炫才使博、“困难见巧”的倾向正是在这首诗中首次得到了高密度的呈现。这昭示着“扬子”想象的学人认同在学术之外，还蕴含着文术一脉。

## 二 学术与文术：扬雄传统与山谷的诗学实践

《文心雕龙·才略》有言，“自卿、渊以前，多

俊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sup>[50]</sup>。扬雄的知识主义渗入创作的层面，体现为引书助文、辞艰言深的辞章倾向、构成才学之辨中重学一派的先声。这种依傍学力的创作倾向与其“非圣哲之书不好”<sup>[51]</sup>的宗经立场有关。扬雄以为“圣人之道幽微深渺，文辞亦“不可齐于庸人之听”<sup>[53]</sup>。其文必艰深是拟经的结果。而与此同时，扬雄的引书助文也是一种辞章观念的体现。在扬雄看来，“能读千赋，则能为之”<sup>[54]</sup>。学力对于文辞的成就必不可少，故欲为“沉博绝丽之文”<sup>[55]</sup>，必有赖于潜心观书石室的积淀。这也便是《文心雕龙·事类》所言，“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sup>[56]</sup>。

扬雄为文使典隶事而辞艰言深的特点为中唐韩愈一派所承继，进而影响北宋古文家，被列入文统的谱系。然至欧苏等人重构文统，便有扬雄“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讥，将《太玄》《法言》及其赋作一并视为“雕虫篆刻”<sup>[57]</sup>。与之相较，山谷的态度有所不同。其《杨子建通神论序》一文论列“文章之工”言及扬雄，以为“法度粲然，可讲而学”<sup>[58]</sup>。方孝孺《与舒君》梳理文章流变，也指出扬雄与山谷二人之相契，“汉之司马迁、贾谊，其辞似可谓之达矣，若扬雄则未也。唐之韩愈、柳子厚，宋之欧阳修、苏轼、曾巩，其辞似可谓之达矣，若李观、樊宗师、黄庭坚之徒则未也”<sup>[59]</sup>。方氏承续苏轼的“辞达”说，以为文章之“达”当“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而扬雄则以锻炼艰深见长。以下所言李观同韩愈交好、樊宗师为韩门弟子，为文措辞皆有奇僻生涩的特征，而至宋代则唯举山谷一家。确如刘辰翁所言，山谷“行文最涩”<sup>[60]</sup>。但相较于文，更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其实是诗歌<sup>[61]</sup>。钱文子《山谷外集诗序》便以扬雄文类比山谷诗，“扬子云草太玄，其词难深，人不能通。乃曰，后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于后世之知我者，若公于山谷，既以子云而知子云”。而山谷诗之难知也正源于“引书以助文”。“上自六经诸子历代之史，下及释老之藏稗官之录”、无不尽究。这尤其以集中载录熙丰时期诗作的外集为典型<sup>[62]</sup>。

事实上山谷早年并不强调学养与诗艺的关系，

而是以“清”为尚。如“清于夷则初秋律，美似芙蓉八月花”“惠连冢上麦纤纤，喜公犹得春草句”，论诗偏好谢灵运诗的自然英旨。“清”作为一种美学范畴的成型见于魏晋南朝，本于道家对法天贵真的追求，暗含着去文饰、贵天成之意<sup>[63]</sup>。用事繁博往往被视为有失“清采”。而至元丰年间所作《毕宪父诗集序》追忆毕宪父，“贯穿六艺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记，射匿候虽种鱼相蚕之篇，鼻嚏耳鸣之占，劾召鬼物之书”，则将博闻强记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要素“今观公诗，如闻答问之声，如见待问之来。按其笔语，皆有所从来，不虚道”，以至于“非博极群书者，不能读之昭然”<sup>[64]</sup>。毕宪父诗今不存，然山谷赠与毕氏的两首诗《送酒与毕大夫》《喜太守毕朝散致政》均以使典隶事见长，后一首七律近乎句句用典。这不仅映现出博极群书的毕宪父的阅读期待，也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山谷创作倾向的转变，伴随“扬子”想象而来的正是一种知识性的创作姿态，为熙丰诗艺的创变大开法门。

这首先体现在熙丰诗对次韵的追求。次韵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唱酬形式，为满足韵字的要求往往需要征引书本诗料，故次韵与用事常常是一体之两面。山谷诗对于次韵的兴趣在熙丰时期愈渐浓厚，不仅多次赓和往还，且多长篇，如《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用其韵》《次韵奉送公定》二诗俱在七十韵以上；并主动选择有难度的次韵，如《用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为韵寄李秉彝德叟》等组诗属于独自完成分韵赋诗，和苏轼“粲”字韵诗等则是专取险韵唱和。再如这一时期数量增多的八音体、建除体诗，将形式的限制放在句首，均是有意增加押韵的难度，以挑战调运腹笥的能力。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王诗原是赠与黄大临的代书之作，韵脚的难度未必有意为之，山谷主动和上一首则是迎难而上。诗中多数韵脚构词皆有出处，如“墨水恶翻建”，《汉书》“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建瓴水”为“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势易也”，“翻建”乃是取“建”与“翻”同义之字造语；“声实溷端窾”，则将《史记》“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压缩于五字之中<sup>[65]</sup>。这种取材造语方式，直接影响到诗歌艺术风貌，使之愈趋生涩古硬。

清人黄爵滋指出，山谷诗“尽多自然佳句，若徒学其涩处，岂非买椟还珠”<sup>[66]</sup>。从题材来说，山谷早年诗中多为“不须乞灵向沈谢”的吟咏山水之作，较少用事。其中“涩处”集中体现在一类谈学论道之作。如《几复读庄子戏赠》前十八句密集化用《庄子》典故，分别就《逍遥游》和《齐物论》的文意进行櫟括，通过剪裁庄子的文本来说理。而至熙丰时期，诗歌表现的知识化向着各类题材漫延。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熙丰时期日常题材的写作。元丰元年《种决明》一诗描写种植决明子而安寝明目的琐事，通篇引书助文。其中经史类典实占去半数，尤使诗歌风貌趋于艰涩。对于一首日常题材的小诗而言，这种“只字半句不轻出”的倾向未免给诗歌带来了过重的负累。而在熙丰诗中，这并非个例。如“蜀王煎菘法，醢以羊彘兔。麦饼薄于纸，含浆和咸酢”<sup>[67]</sup>“甘菹和菌耳，辛膳脰姜芥。烹鹅杂股掌，炮鳖乱裙介”<sup>[68]</sup>描绘食物制作的过程；“骈头沸鼎烹，可口垂涎噉”<sup>[69]</sup>，戏咏口腹之欲等等，均着意使典隶事，以雅言道俗物。

这一引书助文的倾向不仅带来字面上的雅化，题材与典故的落差也推动诗法由“用其语”兼“用其意”走向“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sup>[70]</sup>。与早年好为櫟括相比，熙丰诗中用典的特点正在于“多错本旨”。如山谷元丰初年《次韵师厚食蟹》《次韵谢外舅食驴肠》二诗：

海饌糖蟹肥，江醪白蚁醇。每恨腹未厌，  
誇说齿生津。三岁在河外，霜脐常食新。朝泥看郭索，暮鼎调酸辛。趋踰虽入笑，风味极可人。忆观淮南夜，火攻不及晨。横行葭苇中，不自贵其身。谁怜一网尽，大去河伯民。鼎司费万钱，玉食罗常珍。吾评扬州贡，此物真绝伦。<sup>[71]</sup>

垂头畏庖丁，趋死尚能鸣。说以雕俎乐，甘言果非诚。生无千金鬻，死得五鼎烹。祸胎无肠胃，杀身和椒橙。春风都门道，贯鱼百十并。骑奴吹一吷，馥骏不敢争。物材苟当用，何必渥注生。忽思麒麟楮，突兀使人惊。<sup>[72]</sup>

由于书写对象的俚俗，诗中或征引僻典、或熟典新用，处处夹杂着经史陈言的碎片。如“每恨腹未厌”反用《左传》中语“愿以小人腹，为君子之

心，属厌而已”，原以小人之腹容易厌足来比拟君子之心，山谷诗则反言口腹之欲无厌，以见食蟹味美；“朝泥看郭索，暮鼎调酸辛”整体上效仿《战国策》中黄雀的寓言，“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醎，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借由字面的戏拟将之描绘为珍馐美饌；至诗末数句“鼎司费万钱，玉食罗常珍”，“万钱”语出《晋书·何曾传》“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以之形容少时记忆中的扬州贡蟹，更是在夸饰中道出滋味绝伦。上述一系列典实的化用、铺陈不断抬升螃蟹的“身价”，雅言、俗物相映成趣，语境跳跃，并往往带出拟人化的修辞。如“趋跄”语出《诗经·猗嗟》“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原谓步趋中节，山谷转以比拟螃蟹横行之态，颇富谐趣。《驴肠》诗“生无千金簪，死得五鼎烹”化用主父偃语双关烹食之事，也在用事的错讹中形成庄谐交织的效果，戏将驴勾勒为遭罹饕餮之诛的悲剧命运的主角。至诗末以杨炯“麒麟楮”讽刺“无德而衣朱紫”之典收束诗意、笔触辛辣，使比拟的修辞贯通全篇<sup>[73]</sup>。这在元丰中后期的创作中有一以贯之的表现，如《阻风铜陵》诗中写到被捕捞的长鱧，“斑斑被文章，突兀喙三尺。言语竟不通，噉喙亦何益。魁梧类长者，卒以筌饵得。浮沉江湖中，波友永相失”<sup>[74]</sup>。“喙三尺”见《庄子·徐无鬼》“丘愿有喙三尺”，本是能言的标志，此处嫁接到不能言的鱧鱼身上，将鱼口噉喙之态联想为性命垂危之际的倾诉。“魁梧类长者”见左思《三都赋》序“魁梧长者，莫非其旧”，言其貌似厚德长者却又贪恋筌饵罹祸。这多重典故的双关义环环相扣，便有如一则“枯鱼过河泣”式的寓言，从而引发诗人“有生甚苦相，细大更噉食”的佛理感悟。

总体来说，山谷熙丰诗的依傍才学主要体现在“能转古语为我家物”<sup>[75]</sup>。这与扬雄惯于征引“成辞”的倾向是相近的。相比单纯化用故实的内容，“成辞”的援引侧重“言”，而非“意”。这不仅更能勾连文本与前代典籍文本的关系，也提供了“以故为新”的自由。扬雄的引书助文不仅体现在《太玄》《法言》一类着意拟经之作，也有《逐贫赋》一类的游戏笔墨。其中描写“扬子”与“贫”的论辩，“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沈载浮”“誓将去汝。适彼首阳”等

密集化用《诗经》中的成句以表现二人言辞往来的机锋，以及刻画“扬子”“避席”辞谢、“贫”“摄齐而兴”的恭敬姿态，便是庄谐交错、戏谑经史的诗法先声<sup>[76]</sup>。

而更重要的是，在山谷看来，“子云赋逐贫，退之文送穷。二作虽类俳，颇见壮士胸”<sup>[77]</sup>。扬雄不循常规的造语、修辞正寄寓着“不徇世俗”的胸襟。从这一点来说，“扬子”想象对于诗艺转型的意义也具有精神底色的意味。其元丰时期所作《胡宗元诗集序》便体现着这种诗学的自觉。序中指出，表面上工于文物的“诗人之态”实为“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的末世诗人敛抑怨思、胸次释然的一种方式<sup>[78]</sup>。如胡宗元“穷于邱壑”“自结发迄于白首，未尝废书”，为诗则有“遇变而出奇，困难而见巧”的“诗人之态”。山谷笔下以“扬子”描绘的士人如谢师厚“暮年无所用心，更属全功于诗，益高古可爱，数有酬和”<sup>[79]</sup>，在固穷乐道的同时执着于诗艺，亦有“以文物为工，终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的意味。故在熙丰学官时期，山谷同周遭知识群体的互动，不仅为道义相高的认同感所维系，也体现在专注诗艺的共同姿态。其诗中不无实验感的困难见巧强化了诗歌与书卷的联姻，从而将扬雄“引书助文”的知识主义付诸诗学的实践。而在熙丰科举罢废诗赋的情况下，这种专精诗艺的方式也意味着一种疏离世事而自我边缘化的选择。将知识注入诗歌的作法，对于经术、诗赋截然二分的知识场域正是一种潜在的回应。由此，山谷对于扬雄艺术的继承，本身也呼应着学术的诉求，成为“扬子”学人立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 三 山谷本色：知识性写作的诗史意义

宋诗倚傍才学的知识性倾向在北宋时期颇为突出，以苏轼、黄庭坚为典型。清人赵翼便指出，北宋苏、黄二家“才力雄厚，书卷繁富，旗鼓相当”。但尽管二者才力相当，创作法度与风貌却颇有不同。东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摭摭痕迹”，而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才庀料为主，宁

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sup>[80]</sup>。简言之，东坡不为法度所限、随物赋形、讲求如盐着水、不露痕迹。而山谷以“无一字无来处”为诗法、着意锻炼、生新廉悍。援引故实在苏诗中仅是“供其驱驾”的诗料，至山谷笔下“专以选才庀料为主”，方近乎创作之本位，并渗入风格肌理的层面，力求典、奥，乃至于使“性情”为“才学”所掩的问题凸显出来。其中，点铁成金作为山谷诗法的核心，本质上是一种苦吟锻炼的创作倾向。尽管山谷早年便有“诗非苦思不可为”之说<sup>[81]</sup>，却并不过分倚赖用事。其诗中引书助文的特征有待于熙丰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学官语境所孕育的产物。山谷曾将“君子事业”同“举子事业”对举。熙丰时期“以经术造成人才”，科举罢诗赋而欲令学者“专意经义”，使诗学走向了“举子事业”的对立面<sup>[82]</sup>。而寒士依傍才学为诗、将知识倾注于无功利的诗艺的创作姿态，也就同“举子事业”主导的知识世界构成一股拉力。这种学术立场是形塑山谷熙丰时期诗学形态的重要助力。

宋人对扬雄的接受以道统的叙述为主流，文统一脉始终褒贬不定，自欧苏以降更是多有诟病，山谷的接受弥补了扬雄传统在诗学层面的缺席。这一转向不仅反向塑造了山谷独特的诗学实践，也奠定了宋调的不同分支。元祐二年（1087年）东坡《送杨孟容》一诗自谓效黄鲁直体，通常被视为山谷体成熟的标志<sup>[83]</sup>。从东坡此诗“收敛光芒，入此窘步以见效”<sup>[84]</sup>来看，山谷体的特征首先在于押韵上的险仄。《送杨孟容》一诗押“江”字韵，这一韵脚的运用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为典型<sup>[85]</sup>。这种征引繁博、险中见奇的倾向在山谷熙丰之际同谢师厚等人的诗作往还中已经有所体现。至元丰中后期，山谷唱和的对象逐渐由谢门转移至苏门。由于棋逢对手，山谷多次发起唱和，推动着知识性写作的流布，在“方今明时废声律”<sup>[86]</sup>的熙丰诗坛中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但值得注意的是，苏黄等人的诗作并未因唱酬而风貌趋同。如元丰六年山谷所作《食笋十韵》：

洛下斑竹笋，花时压鲑菜。一束酬千金，掉头不肯卖。我来白下聚，此族富庖宰。茧栗戴

地翻，敲觥触墙坏。觶觶入中厨，如偿食竹债。甘菹和菌耳，辛膳脍姜芥。烹鹅杂股掌，炮鳖乱裙介。小儿哇不美，鼠壤有馀噉。可贵生于少，古来食共噉。尚想高将军，五溪无人采。<sup>[87]</sup>

诗歌由竹笋破土而出写到小儿食笋的琐事，用语艰涩。与其说是书写日常，更近似于才学的展览，仍沿袭着元丰初年谢门唱和的作风。山谷先是主动邀约苏轼唱和，后有胡朝请、萧巽、葛敏修三人相继次韵，随后山谷又逐一和答。由于《食笋》原诗韵脚字生僻，赓和之作亦需搜抉故实以满足次韵，而山谷和诗在用事的密度和难度上毫不逊于原作。如诗中“芥”字一韵，山谷原诗“辛膳脍姜芥”五字已是颇见“刮鬣”。而在其另外三首自次韵中，这一冥搜出奇的倾向有增无减，如“咀嚼千亩馥，胸次不啻芥”<sup>[88]</sup>，上句出自《史记》“渭川千亩竹”，下句化用《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转换语境以突显胸襟之朗豁不俗；“獭胆能分杯，虎魄妙拾芥”<sup>[89]</sup>，语见《本草序例》“磁石引针，虎珀拾芥，戎盐累卵，獭胆分杯”，以生僻名物物类相感来类比竹笋可供佐肴；“箛龙不称冤，易致等拾芥”<sup>[90]</sup>，翻新表达，化用《汉书》“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以言竹笋平常易见。而苏轼的和诗则显现出不同的风貌。其中“萧然映樽俎，未肯杂菘芥”二句虽同样言烹饪饮食之事，却显得素净疏朗，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在家僧疏食饮水的平淡之乐，正有纪昀所言“不粘不脱，玲珑四照”之感<sup>[91]</sup>。又如元丰三年（1080年）斗野亭次韵，诗中“烹”字一韵，孙觉原诗言“尚想紫芡盘，明珠出新烹”<sup>[92]</sup>。山谷次韵为“簾箫吹木末，浪波沸庖烹”<sup>[93]</sup>，语出韩愈诗“还家勅妻儿，具此煎炰烹”<sup>[94]</sup>。韩诗虽用字生新，措意却是平实，山谷以之为譬喻，更见奇崛。之后秦观等人的次韵则并未延续山谷诗的作风，如秦观“村墟翳茅竹，孤烟起晨烹”<sup>[95]</sup>、苏轼“逢人辄自晒，得鱼不忍烹”<sup>[96]</sup>、苏辙“茅檐卜兹地，江水供晨烹”<sup>[97]</sup>，平易浅近，反而切近孙觉原作的风貌。

事实上东坡元祐时期标举山谷体，本身也意味着《送杨孟容》这一奇险艰涩的五古并不构成元祐唱和的主流，它更近于熙丰唱和的余响，真正与之形成呼应的当是日后的江西诗派。如江西诸子

中谢逸同徐俯、洪朋、洪刍的数首唱和之作，《寄徐师川戏效其体》《寄洪龟父戏效其体》及《寄洪驹父戏效其体》，从其中描写好古乐道、“归欤谢远游，曲肱卧环堵”“呻吟六艺学，心醉倚胡床”的狷者之风，到构象奇崛、造语生新不俗，“晴江莹眉宇”“曜灵旋磨蚁”“人物秀春柳，诗句妙澄江”“毛锥摘秋颖，茧纸截水苍”，引援书本以成譬喻，多可在山谷诗中找到源头<sup>[98]</sup>。而谢逸以此为三人诗作之“体”，正可见出山谷体对于江西诗派的示范意义。其中唯寄徐俯一首相对平易，二洪两首锻炼刻苦，求奇而至于语中带涩，尤其形肖山谷五古。其流衍至极，便是江西格“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sup>[99]</sup>的特征。对此，比较典型的是李彭《夜坐食蛤蜊》。诗中就日常琐事着意烹炼、造语艰涩。其中如“雀醢誇挟纩”“蚝山怜叠嶂”<sup>[100]</sup>，构想奇警，有化用山谷诗“秋霜落场谷，一一挟茧絮”“相粘蠓山作居室”<sup>[101]</sup>诸句的痕迹。而诗歌戏以蛤蜊为“风期高亮”，在琐事的小题大做中寄寓山林独往、会心濠濮的心怀，也复现出山谷熙丰时期的“诗人之态”。可以说，熙丰诗艺的知识化在成就“山谷本色”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埋下了日后“江西诗味”的伏笔<sup>[102]</sup>。

北宋后期的科举风气造就了一批疏离举业、执著诗艺的“边缘人物”<sup>[103]</sup>。其时“专意王氏之学”、废禁元祐学术、进而连及诗赋<sup>[104]</sup>。“山谷体”与“江西诗味”之间的诗学回响，是江西诗派承续元祐学术的一种体现<sup>[105]</sup>。而其仿效山谷“字字有出处”之法度<sup>[106]</sup>、缔结学问与诗艺的做法，亦同举业中固化的知识秩序构成一种无形的抗衡。事实上山谷指导江西后学，正是将“为道之学”置于首位，“闲处纯用日力读书，不至妨甘旨，此亦人生至乐事。利囊涂割，自可一切放之”<sup>[107]</sup>，强调读书当“见古人用心处”<sup>[108]</sup>。而江西诸子也以“学古”为要，其诗中“好古嗜简编”<sup>[109]</sup>的学人形象可谓山谷笔下“扬子”的一种延续，“天津白玉郎，看花惊洛师。吾人守环堵，草木相娱嬉。逍遥各自适，慎勿相唐嗤”<sup>[110]</sup>。如晁说之谓徐俯“人人垂首相公前，独子低眉古简编”<sup>[111]</sup>、洪朋刻画王立之“城南逸少孙，软语可与晤。闭门谢俗子，著书无窘步”<sup>[112]</sup>，以及谢逸笔下反复出现的

半世寒俭而胸中万卷的寒士等等，相似的形象刻画中蕴含着同道之意。而其中陈师道因心非新学而绝意仕进，洪朋、谢逸等人不第而布衣终身，也确实做到了固穷守道。对于北宋后期这一批士人，山谷熙丰时期独立于俗学的学人追求实有精神风向标的意味，山谷体对于江西诗派的影响也当从这一点予以考量。

黄庭坚的知识性写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诗歌与前代典籍的关系，书卷的运化有如一道屏障隔开了诗与真实，使诗歌相对摆脱对于外物感发的倚赖，走向文本之间的沟通、对话，迎合了江西诸子自觉疏世的书斋生涯。而在罢废诗赋的情况下，将学养倾注于“无用”的诗歌，本身就含有将知识去功利化的特点。诗歌表述知识的方式与范畴上的多元对于既有的知识秩序有如一种解构。从这一点来说，知识性写作也是学人立场的一种隐性的发声。其自身在相对于“举子事业”的语境中，也作为一种“学”而具有了特殊的承续意义。山谷“扬子”想象背后所蕴含的学术与文术的双向交织，可以说是催生熙丰山谷体乃至北宋后期诗学形态的重要机制。这在参与建构宋调的同时，也丰富着宋调自身的面相。从熙丰时期山谷从谢师厚学诗、切磋唱和，至江西诸子自觉承续山谷诗法，这一师友承传的流变线索，构成宋调演进中的一脉分支，诗学中的知识传统由此获得了学理与实践上的自足。

只是书卷与书卷的对话在更新诗料的同时，也会陷入另一种窠臼。当“扬子”形象背后的学人诉求在江西末流之中流失殆尽，其精心锻炼的诗艺倾向也难免流为陈言故实的枯涩拼接。山谷元祐以降的创作事实上对熙丰已有反思，至江西诸子流弊渐出、穷极思变，吕本中等人活法说融通苏黄、“遍考精取”，欲以弹丸流转革除艰涩之弊，乃至呼唤“万象”的回归，已然在消解着知识本位的创作方式。昔日山谷诗由典故编织而成的七宝楼台，就此成为宋诗演进至北宋中后期的一道独特风景。

## 结 语

关于黄庭坚诗歌的研究，通常是从山谷的诗学



表述中提炼出诗歌法度，并以此概观山谷体的特征。这往往会使山谷诗歌风貌的定义流于表面，并掩盖了诗歌流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张力。本文试从山谷的“扬子”想象出发，考察山谷如何将这一接受史的命题引渡到诗学的领域，从而开拓出具有“山谷本色”的知识性写作。

所谓“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sup>[113]</sup>，扬雄的“文”“学”兼备，决定了他在后人诠释中的多面走向。这种丰富性使“扬子”得以构成黄庭坚熙丰时期学术语境与诗学实践的交汇点，进而揭示出形式表象背后的文本生态。故“扬子”想象不仅是一个扬雄接受史延伸出来的命题，也作为一种视域，在“文”与“学”的互动历程中观照宋诗的知识化。首先，“扬子”背后学术与文术两条线索的交织，为考察学问渗入宋诗肌理的方式与形态提供了参照。山谷的诗学实践注重学力，可上溯至扬雄的“引书助文”，形成熙丰诗歌富于实验感知识化转向。这种文术的接续始终以“扬子”想象的学人心迹作为精神底色。山谷“困难见巧”的“诗人之态”不仅并非因“才学”而掩盖“性情”，而正可视为中唐诗学借由冷静的诗艺“制作”传达主体性的一种延伸<sup>[114]</sup>，为重审宋诗的依傍才学提供了一种角度。其次，学术不仅塑造了文学的表现形态，也因载体的选择而形成自身场域的分化。黄庭坚的诗歌之所以成为北宋后期诗坛的集体选择，不仅是诗歌史自身的命题，也同新学笼罩下的学术场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山谷体的语中带涩，至江西诸子锻炼艰深，其创作背景均为经术、诗赋割裂的学术语境。知识性写作为重新缔结诗歌与学问的联系提供了一种范式，看似拘泥于书斋，实际上也回应着士人所身处的知识世界，并演化为元祐学术的一部分。从这一点出发，黄庭坚个人诗歌史中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山谷本色”，何以成为宋代诗歌史与学术史交织下的重要坐标，也正可借由“扬子”的诠释空间而收获更为立体、具象的认识。

[1]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第152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关于宋人对扬雄的接受，参见刘成国《论唐宋间的

“尊扬”思潮与古文运动》（《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等。

[3] 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第8册，辛更儒笺校，第4023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4] 黄庭坚熙宁、元丰时期的诗作主要见于山谷外集。关于黄庭坚诗歌的分期研究，参见钱志熙《黄庭坚诗分期初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张承凤《黄庭坚诗分期评议》（《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黄君《黄庭坚生平五期八段说》（《黄庭坚研究论文选第3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

[5][8][10][13][15][19][24][25][28][29][32][33][34][36][42][49][65][67][63][69][71][72][74][77][87][88][89][90][93][101] 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第621页，第695页，第899页，第547页，第589页，第1075页，第592页，第597页，第961页，第598页，第559页，第560页，第695页，第659—660页，第783页，第557页，第554—556页，第702页，第879页，第882页，第623页，第624页，第734页，第870页，第879页，第880页，第881页，第882页，第728页，第7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7][9][14][35][66] 黄庭坚：《山谷诗注续补》，陈永正、何泽棠注，第338页，第358页，第297页，第287页，第359页，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1][44][47][52] 扬雄：《法言义疏》，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第123页，第215页，第31页，第15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 汪注：“有所知而不用，则其知若赘；有所不知而不益，则其知必亏。能用人所不用，则知不赘；能益人所不益，则知不亏。不知则求所以知之，知之则求所以用之。此智者之事也”，见扬雄：《法言义疏》，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第123—12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相关研究参见王青：《扬雄评传》第五章“扬雄的知识论”，第198—2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73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 参见葛晓音《八代诗史》，第114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18] 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第6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以扬雄自拟，是渗透《五柳先生

传》全篇的底蕴”。陶潜晏如而居、忘怀得失的五柳之乐，构成扬雄书写的又一线索。宋诗中多有“五柳式”扬雄，而山谷对扬雄的书写则更近于左思，如其诗中“扬雄老执戟，金张珥汉貂”，以金日磾、张汤之典作比；“五侯盛宾客，驺讐交横驰。时通问字人，得酒未曾辞”，以冠盖拥簇衬托寒士独居等等，均带有拟古的色彩。

[20][21][37][40][43][58][62][75][79][107][108]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郑永晓整理，第1509页，第778页，第199页，第197页，第947页，第937页，第1784—1785页，第384页，第151页，第632页，第72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2][54][55][76] 扬雄：《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第193—194页，第274页，第264页，第146—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3] “（扬雄）主要是以好奇好异之心，投下他整个生命去追求知识。他当然也谈到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但他都是以知识人的态度去谈，有点近于冷眼旁观，而不将自己介入地去谈。所以他是一个“知识型”的人生形态。近于西方所谓“智者”形态的人物、“这在两汉是非常突出的形态。《法言》‘或问人何尚？曰尚智’，这正是他自己性格及趣尚的表明。这是了解他的基点”，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册，第421—436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26]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1册，第3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27] 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第632页。山谷熙丰诗中多有对寒士的刻画，如“身忧天下自有入，寒士何者愁填臆”“历下两寒士，箪瓢能悦亲”“世传寒士有食籍，一生当饭百瓮菹”“岁丰寒士亦把酒，满眼钉短梨枣多”等等。其时山谷的唱酬对象如沉沦下僚的张沙河、廖正一，塾师林为之，学生谢子高，以及亲族中的李秉彝、谢公静等，多为落魄不偶的贫寒士子。这一交游群体的特征也是奠定“扬子”现象的重要因素。

[30] 参见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第195—19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48] 毛滂：《上苏内翰书》，《毛滂集》，周少雄点校，第17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8] 参见钱志熙《黄庭坚哲学思想体系述论》，《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

[39] 例如“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等，见扬雄：《法言

义疏》，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第31、251页。

[41] 毕仲游《理会科场奏状》：“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谓传注之学，不足决得失，则益以新说。新说不足以决得失，则益以佛老之书，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0册，第21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第6056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46] 胡煦：《周易函书》卷十，程林点校，第29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50][56]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第699—700页，第6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51] 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颜师古注，第351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53] 扬雄：《解难》，《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相关研究参见许结：《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成国：《论唐宋间的“尊扬”思潮与古文运动》（《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

[57]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第141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59] 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卷上，第22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60] 刘辰翁：《答刘英伯书》，《刘辰翁集》卷七，段大林校点，第23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1] 钱钟书指出，“涩之一字，并可许目黄诗耳”。参见蒋寅：《“涩”作为诗学概念的意味》，《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63] 参见蒋寅《清：诗美学的核心范畴——诗美学的一个考察》，《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第32—55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64]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下册，郑永晓整理，第151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序中有言，“宪父没后，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诗若干篇以示豫章黄庭坚”“庭坚既作铭诗，刻之下宫，又论其学问如此，载之家集”。元丰五年山谷作《朝请郎知吉州毕公墓志铭》。按此文意，《诗集序》与墓志铭当相去不远。元丰六年底山谷离开太和赴任德州，尔后山谷与毕平仲似再无往来，故以《诗集序》定于元丰后期为宜。

[70] 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笺校,第435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73] 史容注:“《朝野僉载》云: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恃才简傲,目朝官为‘麒麟植’,人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及脱去皮褐,还是驴耳。无德而衣朱紫,与此何异。’”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第625页。

[78] 黄庭坚:《胡宗元诗集序》,《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郑永晓整理,第303—304页。相关研究参见伍晓亮:《江西宗派研究》(第79—80页,巴蜀书社2005年版),“‘呻吟调笑之声’反映着时代对人的挤压、人在逆境下的道德努力,以及在逼仄的空间中,‘遇变而出奇,困难而见巧’,所能生成的情感空间和诗性天地。”

[80] 赵翼:《瓠北诗话》,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1] 洪炎:《题山谷退听堂录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3册,第289页。关于“苦思”在山谷诗学中的发端意义,参见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第195—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2] 黄庭坚《与周甥惟深》:“亦不必专作举子事业。一大经,二小经,如吾甥明利之质,加意半年可了。当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业耳。”《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郑永晓整理,第642页。祝尚书《“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指出,“(在宋人看来)‘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本经’与‘外学’,已造成价值取向的彻底裂变,而两者的轻重,则被科举完全弄颠倒了”“他们就生活在这种价值裂变后的矛盾和无奈之中”。关于熙丰经义取士造成的“文与经家分党”,参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141—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83] “山谷体”最早见于元祐二年苏轼《送杨孟容》一诗“自谓效黄鲁直体”。相关研究参见陈俊山:《“山谷体”漫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84][96] 苏轼:《苏轼诗集合注》,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1397页,第13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5]《历代诗话》,何文焕辑,第27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6][92][98][100][109][110][111][112] 北京大学古文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3596页,第7544页,第14826—14827页,第15881页,第14855页,第15766页,第13816页,第144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1] 苏轼:《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等校注,第245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4] 韩愈:《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集释,第7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95] 秦观:《和孙莘老题召伯斗野亭》,《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笺注,第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97] 苏辙:《和子瞻次孙觉谏议韵题邵伯阨上斗野亭见寄》,《栾城集》,第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99]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8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2] 参见祝尚书《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103]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283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104] 吴曾《能改斋漫录》:“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第96—97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105] 参见张明华《徽宗朝诗歌研究》,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06] 山谷“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之语是在与洪驹父的书信中提出的。江西诗派相关诗论也多言及这类诗歌法度,如《洪驹父诗话》“山谷言唐彦谦诗最善用事”、《紫薇诗话》言“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等。

[113]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六,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第1076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4] “这种沉思与锻炼,近乎工匠制作器物一般冷静沉着,但在这对诗艺技巧的锻炼中,涌动的是不可束缚的强力的‘自我’。这种热力与冷静的交融,造就了中唐诗奇异的品格”,参见刘宁:《唐宋诗学与诗教》,第2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